

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中国威胁论

美国国际关系的最著名学者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2001年10月出版的力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驱散了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颇为流行的各种自由主义，如“历史终结论”、“大战过时论”、“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以及“国际制度和和平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盲目乐观，断言大国政治仍处于悲剧式的历史循环之中，认为21世纪前期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引起了美国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舆论界的高度关注。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该书被认为是继1979年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之后现实主义的又一里程碑式著作。

与主张以相对权力追求相对安全，即所谓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为代表）不同，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以相对权力追求绝对安全，《大国政治的悲剧》集中阐释了这一理论。该书从历史的长时段出发，认定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大国的生存意志是追求自身权力最大化，即地区霸权（但由于海洋对投送力量的阻遏作用，使全球霸权不可能获得），因而大国间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冲突。而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美冲突将不可避免。中国会和当年的美国一样，提出亚洲版本的门罗主义，将美国赶出亚洲，因而主张及时限制中国发展，反对外接触而主张遏制中国。

米氏的中国威胁论与其他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有两点不同。其一，威胁原因不同。米氏认为中国威胁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必然结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以军事力量为基础，以经济财富为后盾的陆上强国的作用，是从一种历史的、悲剧式循环的角度看待中美冲突，这与中国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国内政治或领导人意志等无关，是客观的、历史的必然。其二，威胁内涵不同。米氏并不像历史现实主义那样将中国与两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不满足国际体系现状而挑战之类比，而是认定中国威胁乃大国政治自身逻辑演绎的必然。任何其他强国崛起都会形成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形成冲突。中国威胁的不是国际体系，而是美国霸权。

虽然很难评估米氏理论对包括美国国防部决策层在内的华盛顿保守势力有多大影响，但该书出的

版恰逢“9·11”之后不久，其保守主义历史观及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许多方面正好与国防部保守派占上风的布什政府外交理念相吻合。例如，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基于能力而非意图的威胁观，又提出对中国的防范等。这说明，“9·11”事件分散了美国提防中国的注意力，但并没有改变其基于能力而非意图的传统大国政治思维。因此，对此书所阐释的理论与观念，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王义桅 著）

谈谈社会资本

看起来，人们已经对下述假设的合理性达成广泛的共识，即社会网络能够影响到经济的运行。其中，人们谈得最多的是“信任”。信任能够促进经济进步，这即使是在经济学家当中也是一个早已被讨论的话题，博弈论中的“声誉效应”（reputation effects）就是其理论基础。但还有一个问题，人们却很少谈及，那就是社会的交互作用（social interactions）可能带来积极的影响，也可能带来消极影响。最近研究过的一个模型，就包括了一些这样的个案，在其中，个人的好行为和坏行为的选择（例如，长期接受教育，非法行为，犯罪等）受到他所处网络中的周围人的影响。这可参看格拉泽、萨瑟多特、申克曼（Glaser, Sacerdote, Scheinkman）的研究。好行为会扩散，坏行为也如此。

另一个广泛的共识是，交互作用的动机不是经济的。人们可以通过朋友或熟人网络找到工作，但他们在许多情况下，不会为了这个目的加入这些网络。社会网络能够防止由不均衡的信息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它们是一些补充性的活动，能够开创出依靠其他活动开创不了的调节工具。

在某些情况下，当好处丰厚或者存在着外部干预时，社会组织能够依靠有意识的行动而创立。有人说，在存在着真正的参与的时候，这些组织比它们在受到自上而下的管理的时候更有效率。这些组织是不是一种社会“资本”的形式，其后果和自我管理的“自发的”社会网络是一样的？它们在任何情况下或在任何规模水平上都更有效率这一点，是否得到了真正的检验？这还不能肯定。

在“社会资本”的假设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